

種姓政治與農民自殺

文諾·萊納 Vinod Raina

近年的發展經驗表明，普通民眾和社會運動界對「聯合進步聯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 UPA) 所寄予的希望根本是沒有根據的。在 2004 年大選中，由於聯合進步聯盟掌權，人們的希望被點燃。沒有人會想到掌權的右翼「國家民主聯盟」(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會在競選中失敗。

新自由主義以近乎報復的姿態歸來

該聯盟以「閃亮印度運動」(India Shining) 進行選戰。他們的失敗，意味著在「閃亮印度運動」中處於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受到了堅決的抵制。普通民眾一致確信，印度將會在《泰晤士報》、《經濟學人》週刊以及印度國內媒體上閃亮。但是對普通民眾來說，他們史無前例地領受這些苦難：農業債務、糟糕或不足的教育、糧食不足、工作機會減少，被迫的遷移和腐敗等問題。

至少聯合進步聯盟的一些成員或者支持者，尤其是左翼黨派意識到民眾迫切要求處理這些問題。當大量來自社會運動的人士，以及支持他們的知識分子和學術界人士，受到諮詢或要求組成委員會研究這些問題時，這一點就更加明顯。這些委員會包括：國家諮詢委員會(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Central Advisory Board for Education)、無組織勞動委員會(Commission for Unorganized Labour)、國家農村衛生委員會(National Rural Health Mission)。在聯合進步聯盟掌權的一年內，隨著《知情權法案》(Right to Information Law) 以及《農村就業保障計畫》(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 通過，民眾的希望被點燃了。

但一系列的挫折卻又衝擊著剛燃起的希望。新自由主義利益集團以一種近乎報復的姿態歸來。就以農民自殺為例。幾天前，食品和農業部長向議會報告說：自從 1993 年印度的經濟被自由化和私有化以來，有大約 10 萬又 428 名農民自殺。這實在是令人震驚的數字！

就在總理視察馬哈拉斯特拉邦（Maharashtra）農民自殺集中地區之一的威沙巴哈（Visharbha）當日，3 起自殺事件發生在臨近地區。甚至是在他宣告減輕農民負擔後，還有其它自殺事件發生。

死去的農民已經高聲並清晰地喊出：減負並不是他們需要的，他們需要是系統的、結構性的，包括信貸、訂價和農業投入在內的農業經濟法和計畫，而不是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允許的某些措施。WTO 杜哈談判的失敗並不太令人吃驚，因為除了其他原因，印度反對就農業進行談判，至少農民的自殺保證了這點。

然而，由頑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領導的國家計劃委員會（Nat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和財政部，在本身就是籌畫開放印度經濟的經濟學家總理的支援下，堅決反對系統的、結構性的有利於農民的改革，因為他們堅信全球化的農業。在這種情況下，印度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大會上所持的農業方面的立場，還能持續多久呢？

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也是如此。印度擁有巨大的依靠著公共資源如土地、水、森林、和其它自然資源生存的人口。一旦他們被剝奪這些資源，就沒有其他的選擇來保證其生存。大壩和道路的建設、城市化、採礦業、機場、遊樂園和聖堂的建設需要大規模的遷移居民，導致許多人失去賴

以生存的資源而被邊緣化。

在這些論題上開展鬥爭的著名例子是「反納瑪達水壩運動」（Narmada Bachao Andolan, NBA）。該組織由那些因納瑪達大壩建設而搬遷的人組成。在最高法院干預下，一項法律出台了：即將建成的薩達爾薩羅瓦（Sardar Sarovar）大壩的高度，只有當遷移人口都得到重新安置後才能增加。

由於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大部分因先前工程而遷移的人並沒有得到重新安置，NBA與政府交涉，要求停止 2006 年 3 月批准的工程的進一步建設。他們的要求被政府漠視，這促使 NBA 在德里繼續絕食行動和靜坐。行動得到包括左翼政黨在內的空前的支持，當然還有媒體的大力關注。

「預留名額事件」尖銳反映種姓問題

政府派遣了 3 個中央部長組成的委員會去核實被驅逐者的要求。這個委員會認可抗議者的證據，並要求總理採取行動。但是總理卻逃避責任，要求法院干預。在這場規模空前的運動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它先前的判決，以太草率為由，撤銷了 3 個部長的報告，並允許建設繼續進行。法院的這個決定和總理的姿態，使全國各地被強制搬遷，並為爭取社會公平而戰的人民和運動，對其徹底失去信心。

當納瑪達的抗爭還處於騷動中，一個不尋常的抗爭又發生在德里的大街上。領導者不是賤民（dalits）、原住民（adivasis）或是任何被迫搬遷的人，而是中產階級的醫學學生！他們抗議政府宣佈在高等教育機構為一部分下層印度種姓增加 27%預留名額的計畫。這一計畫得到國家議會的支持，於是地獄之門打開了。由於數以千計出身印度上層種姓和中產階

級的醫學學生將會承受絕大部分影響，於是他們成為新自由主義媒體和大公司知識分子眼中的英雄。他們認為，種姓名額預留的制度將損害印度高級種姓的品質，將損害印度員工在資訊、管理和業務流程外包（BPOs）上的競爭優勢。

沒有比這個「預留名額事件」更能尖銳地反映印度社會內部世襲種姓分歧的問題了。這一事件也暴露了新自由主義者的雙重標準。一個月前，他們還在為逗留德里將近一個月博帕爾（Bhopal）毒氣受害者以及納瑪達遷移者使用街頭進行抗議活動而抱怨。新自由主義者認為那些被邊緣化了的人，正在給城市生活造成負面影響，並降低了效率。但是當他們自己的人走向街頭的時候，他們這些論調都不見了。他們被同樣的媒體和利益集團所讚揚。結果，掌權的聯合進步聯盟內部的巨大分歧對外暴露無遺，而「預留名額事件」也遠遠沒有得到解決。

意識形態分歧公開化

正當前邊提到的兩個社會運動的取得勝利的時候，《農村就業保障法案》和《知情權法案》卻開始變質了。前者被馬馬虎虎地執行，後者乾脆被徹底淡化。《知情權法案》本可以有力遏止猖獗的腐敗並且有助於明確職責，要求政府人員履行應盡的責任，因為它給予每一個有需要的人接觸政府檔案和資料的權利。由於害怕官員紀錄公開而被問責，官僚機構開展了一場悄然無聲息的鬥爭：他們努力使他們的紀錄不列入法律管理範圍之內，這樣一來，政府官員個人的行為將不為人所知。政府不顧社會運動的憤怒和厭惡，通過了一項修正案，而這項修正案又受到來自印度各地反對抗議的質疑與挑戰。

為消除社會運動和政府之間的不滿，政府讓每個州得以自行處理《教育

權利法案》（Right to Education Bill），它是具有重要地位的第 86 號修正案的結果，賦予 6 到 14 歲的兒童受教育的權利。該法案本擬提上議會，按日程通過，後來卻停止中央立法而降低到每個州自己立法。多年的抗議活動致使議會通過了第 86 號修正案，但是中央政府深知憲法所支持的權利將會對政府開支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並且它也不符合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利益。

聯合進步聯盟政府依靠左翼黨派的支持。然而，它的行為，包括印度與美國的核子協議、機場私有化、出賣公共部門財產，已經導致原有的意識形態分歧公開化。社會運動現在發現新自由主義在聯合進步聯盟內部占統治地位，並開始公然與之敵對。不僅僅社會運動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是一個令人堪憂的問題，而今又第一次出現了對於聯合進步聯盟能否存在下去的憂慮。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右翼宗教原教旨主義者正在周圍伺機反攻，可供廣大民眾和社會運動的選擇，就猶如被夾在油鍋和爐火之間那樣進退維谷。